

从博士到斗士

《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在重要位置、用大量篇幅刊发了福建小说家陈毅达的长篇小说《海边春秋》,小说聚焦岚岛(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改革建设,讲述年轻干部到岚岛改革建设前沿阵地成长的故事。可以说,《海边春秋》是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的重要收获之一。

《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中肯定了这部小说,认为《海边春秋》“描绘出了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与人生成长的斑斓画卷,也让刘书雷由嫩书生到实干家的心性的转变更加真实可信”。并由这部散发着时代热腾腾气息的小说生发出去,提出了新时代对作家的新考验的观点:“新时代现实题材书写,是对作家能否保有新鲜的思想敏锐性、能否具备足够的创作完成度、能否秉持初心并在对时代生活的真切体验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的考验。因此也可以说,新时代,检验着我们作家的认知水准、行动能力和综合素质。”看来,陈毅达和他的《海边春秋》完成了这种考验。

《海边春秋》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小说。其“重大性”表现有三:其一,内容重大。青年干部是改革发展的生力军,小说讲述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由青涩成长为中坚的故事;其二,场景重大。以岚岛综合实验区建设开发的火热现场为切入点,折射出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大场景;其三,群体力量。小说塑造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有担当、善谋划、亲人民的干部群像。是一部语言质朴、生活扎实的较为成功的新时代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现在就是要培养大批善思能干的干部,我希望你能从学业上的博士,变成岚岛改革开放奉献才智的斗士。”这是小说开头一位领导对小说主人公刘书雷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题眼”——从书斋的“文学博士”成长为服务改革的“斗士”。

刘书雷,文学博士,省作协副处级干部,受党组织委派,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岚岛综合实验区“援岚办”挂职锻炼,成为几百名援岚干部中学历高、年纪轻、资历浅的干部之一。小说用大量笔墨浓墨重彩地讲述刘书雷在海风激荡、烈日高照的岚岛,如何从“书斋博士”成长为“改革斗士”的故事。

新现实的叙述难度

如何有吸引力和有说服力地向读者展示刘书雷的蜕变历程,是小说的难点,也是小说成败的关键。可以说,作者用有一定难度的叙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让故事有吸引力。好读,对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阅读吸引力,是小说的第一要义。把小说写得吸引力十足并不容易,尤其是这种主旋律

式的社会政治小说更难。《海边春秋》利用矛盾冲突、叙述谜局、错位人物等方式让刘书雷的故事很是吸引人。大公司兰波国际斥巨资开发岚岛银滩国际旅游,涉及蓝港村整体搬迁,蓝港村民不同意搬迁,当年轻的刘书雷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时,以前负责搬迁的干部来过两轮也没解决问题,兰波国际因工期曾试图强拆被试验区制止,刘书雷该怎么办?小说充分利用集团利益与群众利益、整体发展与村庄发展、大局与小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来结构小说的故事情节,小说在一环套一环的冲突中往前推进。同时还设置叙述谜局制造故事的紧张感,来历不明的网名“海上蓝影”在网上试图掀起民意波澜,在工作推进艰难时,“海上蓝影”正通过网络组织村民聚会商议“大事”,“海上蓝影”是谁?是否掀起了波澜?这些谜局颇为吸引人。小说还从几组错位的人物中,制造了新的故事魅力,比如青年干部刘书雷、张正海和德高望重的村民大依公、硕士生海妹和公司首席温森森、歌手余望雨,三组人物身份相异、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视角和观念不同,形成了小说中互为张力的人物关系,增添了小说的叙述活力。《海边春秋》因这几方面具有了很强的阅读吸引力。

其次是让叙事有说服力。吸引力是小说的动力,说服力是小说的智力。一部优秀的小说总是在吸引读者之后,然后再尽最大力量地说服读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必然的结果,都是令人相信甚至心有所动的。可以说,好小说始于欢愉,终于智慧和情感。《海边春秋》要克服的叙事智力,是刘书雷如何剥开这个“烫手山芋”并吃下它。很显然,作者陈毅达还是深谙此道的,剥“烫手山芋”比吃“山芋”更难、更重要,小说花大笔力去写刘书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写他扑下身子,用喝酒等“笨”方法和换位思考等“巧”方法,了解人情民意,了解企业意图,思考村庄发展与岚岛发展双赢的最优方式,总叙述汇合到一点,刘书雷找到的剥开“烫手山芋”或者说打破僵局的方法是:不搬迁,与兰波国际一道就地开发蓝港村,让建筑风格独特、富有地方历史文化意味的蓝港石厝,成为银滩国际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

陈毅达《海边春秋》

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物

石华鹏

部分。当读者读到这里时,他们也相信这是解决难题的最佳方案。小说在叙事推进中不知不觉已经说服了读者。当然,吃下这个已经剥开的“山芋”就相对容易了,小说通过上报试验区领导、协调调研、与村民交流等细节描述,在刘书雷的推动下,蓝港村不搬迁的方案落实了,三方都接受了蓝港村发展规划。完美的结局之后,一场盛大而火热的建设开发大幕拉开了。

新时代的新人物

小说在简洁而不失丰富的叙述中,岚岛改革建设中的一块“拦路石”被书生博士搬开了,刘书雷这个人物形象也在这种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叙述中立起来了。初到岚岛的刘书雷,文质彬彬、细皮嫩肉,在“援岚办”抄抄写写、上传下达,经过搬迁事件的磨砺和岚岛海风烈日的考验后,变成了皮肤粗黑、眼神灵光、有创业激情、有韧劲、敢于闯、对岚岛人民饱含深情的成熟干部——成了“大事难事有担当,逆境顺境有襟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年轻干部。

可以说,《海边春秋》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刘书雷这样一个由书斋“博士”成长为服务改革“斗士”的文学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兼具典型性和群体性,而且给人动态的变化之美,是新时代的新人物。与此同时,小说中还有一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仍然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比如金书记、赵主任、吴副秘书长、张正海以及李然书记等,他们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干部,有大局意识,有实干精神,支持年轻干部成长,这也是当下中国干部的一种正面写照。

每个时代都会诞生烙上自己时代印记的文学作品,它所包含的时代背景、时代精神、叙事语言、人物形象等信息留存于作品中,如同随时等待复活密码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大历史叙事

的一部分。这样的作品早已出现并镶嵌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无声地讲述着各自时代的故事,比如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等,这些具有时代概括性和历史参考性的作品,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景观。如果我们把陈毅达的《海边春秋》纳入到这类小说的序列当中考察,我们发现《海边春秋》就是一部反映当下中国改



陈毅达

到一个执政党在推进它的领导、管理和建设中所使用的语言体系——用词习惯、句式特点、话语腔调、语言风格等,毫无疑问,这种语言体系是极具风格的,是独特的,是具有强大力量的。因为作者对这种语言的娴熟使用和简洁有效的追求,并没有让读者有违和感和空洞感,这是我所读过的社会政治小说中,政治语言运用得最为恰当和有效的作品。所以,政治话语的大量使用,成为这部小说另一大特点,小说也因此成为时代的另一种语言记录。如果我们有趣地想一想,很多年之后,当另一个时代的人们读到这部小说时,这种话语风格是不是会让他们闪烁着好奇的眼眸,陷入思考和遐想之中呢?

如果说遗憾的话,我以为这部小说篇幅稍短了,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尽管小说精致而不单薄,但如果增加叙事线索和加大故事篇幅,或许人物的丰富性和时代的复杂性会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或许,作者已经开始酝酿年轻干部刘书雷成长的第二部第三部了,因为美丽的岚岛的故事正在上演,一切远没有结束。

(作者单位:福建文学杂志社)

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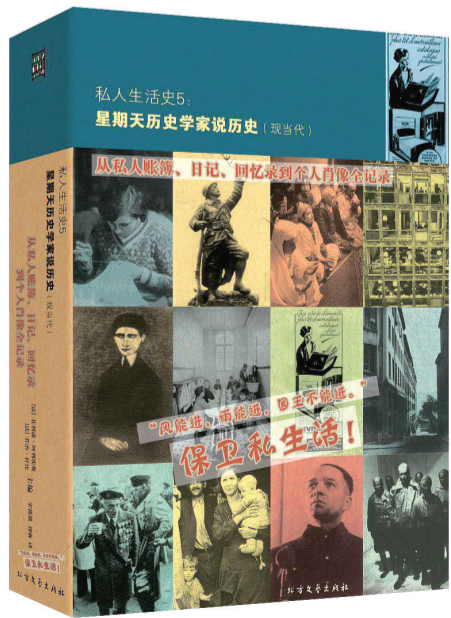
——李晋瑞长篇小说《中国丈夫》的现象学分析 □杜海燕

事件漩涡中的经验对象的情感纠葛,在大事件视域中呈现,用被给予的方式折射出了彼此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隐蔽的,读者观看大事件的视域要通过一定的意识行为将人物并联起来,每个人物的每个侧面以一种“连续的综合”、当前的在场呈现给读者,这些人物当时命运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未来,又包含着前面广阔的未来,因为受到其他侧面的影响,又造成不确定的悬念,这种阅读快感,着实在《中国丈夫》中得到充分释放。

和法国医生之女伊索尔之间不可思议的爱情传奇,借用先验现象学还原的哲学分析,可以体会小说给予读者的全新历史解读视角。

米仓和伊索尔的爱情之路,象征着一个哲学悖论:世界表面上与主体无关,事实上却一刻也不能离开主体。伊索尔是法国小镇不得志医生的女儿,她跟随父亲举家奔赴中国,不想中了镇长和船长的阴谋,父母倾家荡产,受尽屈辱,甚至中途赔上了性命,独留伊索尔在天津和叔叔汇合后辗转内地山西。她目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农村的传教过程,结识了年龄相仿的仆人米仓。无论以西方的阶层观念,还是中国的门当户对,这种主仆关系都是一生的定局。但是,大事件发生了一,民间掀起了反洋教运动。这次运动不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社会关系的重构,还有人性的哲学反思。此时传教士面临两种选择:走向光荣的殉道,或者逃往以暴制暴;本土老百姓却没有选择权,“活下来”便是其饱受苦难中的奢侈品。

伊索尔在叔叔殉道后,生命危在旦夕,而米仓却活下来,这是两人位置的第一次转变。巨变造



成普通人群体日常生活中自然态度的悬置,“世界的预先给予性”被解放出来,政治事件为个体生命带来的影响变化,此时便还原为通过主观意识被给予的现象,于是小说作者把个体命运中的纠缠与民族命运走向的内在关联结合了起来。

作为流民的伊索尔逃到天津法租界姨妈家,和米仓失散分离,又经历了1900年的庚子之变,租界在武装反抗冲突中,人性在暴力刺激下异化,个体欲望变态膨胀,变得失去了民族、文化、性别、伦理的界限。伊索尔的身心再次受难:同是法国人的姨妈变得狭隘自私谎话连篇;表哥西蒙不断强暴伊索尔;表姐波丽娜为了享乐从交际花沦为暗娼;修士鲁本斯变成杀人机器,并用鸦片瘾囚禁占有美丽善良的米香。作者在此表达出:历史资料里看到的客体不能与个体亲历者的感受相混淆,这种沉思是现象学式的彼此反观。

伊索尔和赵家公子赵崇阳结婚是第三个转折。米仓作为家仆与伊索尔重逢,主仆关系再次确定。然而,大事件再次出现,一战爆发了。赵公子成为中国向欧洲战场派出劳工的承办



人,并举家前往法国。伊索尔回到祖国,却无家乡。加之赵公子知晓伊索尔曾被强暴,不是处女,心存芥蒂,使伊索尔更加孤独绝望。小说在这里,展现了性与爱的多层次对撞,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性或性欲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化问题。福柯认为,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表面受过西式教育、彬彬有礼的赵崇阳,其实代表着典型中国士大夫的礼教思想,代表中国式的性爱观念标准:弱势方(家庭中以女性为主)必须绝对服从权威,保持忠诚,性是权威的恩典,爱则随时能被政治发展而扼制。伊索尔遭受性的冷与默,让她如人死牢。而米仓所代表的,是中国平

民阶层的性爱观,如大地般朴实、务实、真实、诚恳,受儒释道教化的慈悲心、互帮互助抱团取暖的宗族观念,苦难中的忍耐力,和战争中破碎不堪的法国农村,在性与爱的需求中,达到了高度的默契。面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小说作者通过米仓在审判席上为自己辩护,揭示了这种善良宽和、忍耐合作的美德,这是无论《圣经》还是《古兰经》,佛经还是《道德经》中提到的,能在世界毁灭之时让人类幸存下来的美德,这也是战争结束后人类自我反省的准绳。

米仓与伊索尔终于在温暖的壁炉旁,性与爱同时融汇在一起,这也象征着中西方文化在互相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给予中融合了。平等的爱,带来了性的最原始的满足,伊索尔在人性的源头处找到了“诗意的栖居”,生命获得了归乡般的重生。

通过《中国丈夫》中米仓和伊索尔爱情线索的梳理,彰显了作者借助细节描述的优势,实现了历史哲思的又一种可能。这部作品的意义如果从现象学角度来描述,就在于作品能够表现出感知历史中应该“存在一种完全不再被直观却被意识的东西的连续性。即一种‘滞留’的连续性,在另一个方向上,则是一种‘前摄’的连续性”。具体地说,事件漩涡中的经验对象的情感纠葛,在大事件视域中呈现,用被给予的方式折射出了彼此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隐蔽的,读者观看大事件的视域要通过一定的意识行为将人物并联起来,每个人物的每个侧面以一种“连续的综合”、当前的在场呈现给读者,这些人物当时命运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未来,又包含着前面广阔的未来,因为受到其他侧面的影响,又造成不确定的悬念,这种阅读的快感,着实在《中国丈夫》中得到充分释放。

(作者单位: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